



大师的智慧

我这个人从不做亏心事，再苦再累也吃得下，睡得香，因为我的良心安然。我的处事原则是：愿听逆耳之言，不做违心之事，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

蒋晔 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

大师的智慧

丁聪

蒋晔著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聪/蒋晔著. —石家庄: 河北人民出版社,
2014. 5

(大师的智慧)

ISBN 978 - 7 - 202 - 07621 - 7

I. ①丁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丁聪(1916~2009)-
生平事迹 IV. ①K825. 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96230 号

丛 书 名	大师的智慧
书 名	丁 聪
著 者	蒋 晔

责任编辑	李春鹏
美术编辑	李 欣
封面设计	艺凡设计工作室
责任校对	余尚敏

出版发行	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人民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)
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刷	河北新华第一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-----	----------------
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印 张	4. 75
-----	-------

字 数	77 000
-----	--------

版 次	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书 号	ISBN 978 - 7 - 202 - 07621 - 7/K · 1071
-----	---

定 价	15. 00 元
-----	-------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言 五十知天命

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，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。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，他因知我、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，所以，在他的努力下，开辟了《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》这一图书系列。正如他的预测，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，得到大家的厚爱，竟连续获奖，精神文明、物质文明双丰收。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！

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，在世琦兄引荐下，我得以幸会小贺。多次交流，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，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，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，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，升华自己的觉悟，并把大师的智慧，去利益众生。

更让我感动的是，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，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，均大力支持这个《大师的智慧》丛书，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、设计与出版，并作

出重要批示。这一情景，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，更加明白了“天命”两字的深刻含义。

“人的命，天注定”、“天命不可违”，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。何谓“天命”？规律也。

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，至今已近20年。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、带有系列性的、在报纸发表的“独”家访谈，到现在的各家报社、杂志、电视、网络，都特别重视“大师的智慧”，此乃“天命”也。众人需要智慧，时代需要智慧。人类失去智慧，世界将会怎样？肯定是毁灭。作为一个人，在社会上生活，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，你肯定到处碰壁，一事无成。为了人生的幸福，去寻找智慧吧！大智慧，便是“知天命”。

“知天命”，就是知“天人合一”的关系。在“天人”之间，真正理解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的规律。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、宇宙里，最根本的是要“顺其自然”，而不可能“人定胜天”。“人定胜天”是小聪明，而不是大智慧。

在大自然里，矿物、植物、动物，千奇百怪，丰富多彩。在动物中，人又是其中之一，形形色色，各种各样。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，你想把这种造化，搞一

次“同化”，那是不可能的，这种要“同化”的思维、行动，其方向就是错误的，下再大的力气，也是无功。理解了“顺其自然”，便会敬畏大自然，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，尊重世界的多元化，尊重文化上的差异，以“兼和”为哲学基础，去为人类造福。

“兼和”者，兼容众异、得其平衡。对“众异”进行“兼容”，其目的是达到一种“平衡”状态。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，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“兼和”思想，在将来日益显耀。我通过他的弟子、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，才知其如此重要，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“中国印”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，被国家所确认。“知天命”者，“兼和”也。

“天命不可违”，即是：“兼和不可违”。“人的命，天注定”，即是：“人的命，兼和来注定”。你拥有多少“兼和”思想，你的“命”就“注定”了多少。

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，其智慧，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，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：“兼和”。这便是大道至简。

蒋 晔

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

目 录

丁聪：我是一个老小孩 / 1

丁聪小传 / 18

丁聪的故事 / 19

小丁大智慧

——丁聪先生的人生对我的启发 / 136

大师的智慧



丁聪：我是一个老小孩

我特别喜欢漫画，因为漫画能引人会心一笑，而笑对人的身心健康实在是太重要了。一个没有幽默感、缺少幽默情趣的人，其生活肯定是枯燥乏味的。记得王蒙有一段话：“从容才能幽默，平等待人才能幽默，超脱才能幽默，游刃有余才能幽默，聪明透彻才能幽默……”

在1997年全国“人大”、“政协”两会期间，我在北京京西宾馆访问了丁聪先生。这是我采访的第一位漫画家，我将平时保存的丁聪的漫画作品集随身带去，让丁先生大为兴奋。他一边翻着自己的漫画集，一边滔滔不绝地回忆起来。

三进三出香港

我们问丁先生：“前几天我们访问吴祖光先生时，他告诉我们您在香港生活过。”

丁聪说：“是的。我在香港前前后后总共生活有10年的时间，三进三出。”

“您是怎么三进三出的？”

“我第一次去香港是在1937年的11月。那个时候上海已经沦陷，我和张光宇、蔡楚生一道乘船来到香港，那年我21岁。在香港，我继续以漫画为武器，揭露日寇的暴行，宣传抗日思想。就是在这个时期，我和夏衍、廖承志、潘汉年等同志接触很多，斯诺、爱泼斯坦还去看过我的画展。1939年，我跟随夏衍从香港来到越南，然后到达广西桂林，接着又到重庆。战时的重庆没有条件拍电影，电影胶片贵得很，于是大家就演话剧，我的主要任务是搞舞台设计。

‘皖南事变’发生后，国民党对重庆的进步文化活动采取种种限制和镇压手段。为了保存进步文化力量，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，一部分文化工作者从重庆转移到香港。这时，香港已聚集了很多文化界人士，进步文化活动非常活跃。我主要是编《大地画报》和参与排演抗日话剧《雾重庆》《北京人》等。这时，我画的漫画很少，主要是因为缺少发表阵地。

1941年底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。圣诞节那一天，日军突然包围了香港。后来，我们在东江纵队

的保护下，扮成难民逃了出来。要不是东江纵队全力保护香港的文化界人士，那损失就会太多了。当时东江纵队所在的地方，就是现在的深圳，我在那里呆了100天，对他们的印象太深了。前些年，广东一家杂志社派人找到我，让我回忆一下当年我在东江纵队的生活，我非常高兴，就画了一组回忆漫画。后来，我在深圳办展览，特意把这组漫画送给了深圳美术馆，以表达我对东江纵队的感念之情。

离开东江纵队后，我先后来到了重庆、成都，参与排演了一些话剧如《牛郎织女》《祖国在呼唤》《北京人》《家》等，画了第一本插图《阿Q正传》。在这期间，为了揭露国民党在抗战后方的腐败统治，我又画了长卷漫画《现象图》。

抗战胜利后，我从昆明回到上海不久，国民党挑起内战，上海反蒋、争民主运动高涨起来。这时候，我画了很多反蒋的漫画，如《四海无闲田》《上海即景——天上飞下来和地下钻出来的‘劫收大员’》《民国万‘税’》等。这些漫画大都登在《周报》《文萃》《民主》和《群众》等报刊上。

与此同时，我还为讽刺蒋家王朝的话剧《升官图》，设计了漫画式的布景和服装。到了1947年，国民党加紧

迫害进步人士，查封了我和吴祖光合编的文艺刊物《清明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随着上海文艺界的朋友第三次到达香港。在香港，我参加了‘人间画会’的活动，并画了揭露国民党投靠帝国主义、镇压老百姓的漫画长卷《现实图》。到了1949年底，我和阳翰笙一起到达北京。”

“您三进三出香港，当时进出香港是不是很容易？”

丁聪说：“香港是个自由港，解放前进出不要护照，可以随便出入。正是这样，在战争年代，香港对保护大陆的文化界人士作出了贡献。邓小平提出的‘一国两制’好得很，把香港收回来了，全世界华人都高兴。绝大多数香港人是中国人，香港的繁荣正是得益于中国人的努力。我们要把香港建设得更美好才对。”

“您在香港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应该说对香港是很有感情的，那您当年为什么还要离开香港到北京去呢？”

丁聪说：“因为那时在香港，中国人再多也没有做主人的感觉。”

天生的乐观主义者

我问丁先生：“夏衍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评价您：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双洞察时弊的眼……对那个时代、那个社会的可悲、可叹、可笑的现象，做了形象的曝光和调

侃，似浅实深，小中见大，每一幅画都会使读者得到会心的苦笑，这也就是佛家所说的‘一针见血’……您对过去那个时代，是如何‘一针见血’的？”

丁聪苦笑着说：“解放后我先是‘当’上了‘美国特务’，然后又被戴上了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分子’的‘大帽子’。直到1979年，前前后后一共被折腾了20多年。真是开了个大玩笑，这个玩笑太大了！”

“您怎么会是美国特务呢？”

“唉，奇怪得很。我在香港画抗日救亡漫画的时候，美国友人斯诺和爱泼斯坦曾经看过我的画展，我们还在一块儿合了影，这张照片竟成了一大‘铁证’。更重要的是，我的另一段经历，使我蒙上了阴影。

抗日战争末期，美国军队曾帮助过咱们中国对日作战。他们的军部在云南昆明，他们让我以秘密的身份进行抗日宣传。当时最有意思的工作是，敌占区的日本人贴出某个布告，我们就照着布告原样，重新设计了抗日的内容，然后再贴在日本人的布告上。解放以后，对我这半年的经历，组织上一直在审查。因为我当时的工作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，所以在大陆没有任何人、任何证据，能证明我并不是‘美国特务’。直到‘文革’结束，有关方面才确认我并不是‘美国特务’。

到了反‘右’时，我的‘罪名’就更多了。还有，‘大鸣大放’的时候，热闹得不得了，我被搞蒙了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。

我一直不说话，保持沉默，想看看再说。1957年5月，单位领导提出一定让我说话，结果‘鸣放’出了一个‘反党反社会主义反苏分子’。1958年，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天，我到医院只看了他一眼，就被‘流放’到北大荒去了。我在一个农场里，劳动了一段时间后，被调到了农垦局宣传处，在《北大荒文艺》编辑部，当起了美术编辑。一直到1960年秋天，我才回到北京。”

与丁聪在北大荒相识、相知的丁继松先生，是这样描述当年情景的：“50年代末期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《北大荒文艺》编辑部，集中了一批著名的作家、画家和编辑，如丁聪和聂绀弩都在那里。尽管带着心灵上的沉重创伤，但丁聪的脸上依然挂着乐呵呵的笑。

他是《北大荒文艺》的美术编辑，除了给作品画插图外，还要负责每期的版样安排、校对。由于他的‘特殊’身份，他画的插图不仅没有稿费，还不能使用他一贯使用的‘小丁’之名。于是，他便起了‘学普’和‘阿农’的笔名。终审稿件送到印刷厂后，剩下的事儿便全落到他身上。每期刊物都有10万余字，他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校对；

页码上出现了空白，他要画插图补上。直到杂志装订成册后被送往邮电局，他才能松上口气……在那个时候，编辑部的编辑们不仅要保质保量，及时编好稿件，而且还要在不断的劳动中改造世界观。丁聪的劳动态度被公认是最好的。”

丁聪接着说：“那一段，我夫人受罪了。她带着刚出生的孩子，远在北大荒的我，无法照顾她和孩子。后来，我先后在北京郊区的几个干校里放羊、养猪，什么活儿都干，曾在一个冬天里，把20多只羊放养到60多只。”

从1932年就与丁聪成为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的好友夏衍先生曾说：“小丁是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，在抗战的艰苦岁月里，在1957年受到不公正待遇、被流放北大荒的时候，他总是笑口常开，很少看到他愁眉苦脸的样子。他助人为乐，从不考虑自己。我喜欢这样的人。”

丁聪讲：“在这20多年里，虽然失去了工作权利和作画的权利，但是只要有机会，我仍是不忘画画，偷偷地画。在北大荒时，我画我种的田地，我画我住的房子，外景、内景、全景等，还画过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。我偷偷画画被人发现后，画笔被没收了，我就用剪子剪画，剪我养的猫、狗、猪、羊。我剪的画，很多人都来要，剪出多少就被抢走多少。

1976年9月，我从干校回到中国美术馆继续反省‘错误’。当时，美术馆里有许多作废了的卡片，背面很适合作画，我就想到要为鲁迅的小说搞一些插图。于是我每天偷偷画一幅草图。就这样，我画了33张。

有一天，我身体不大舒服，就到附近的医院看病。医生说我的血压很高，要休息一个星期。生病休假了，我不就有时间画画了吗？参加工作以来，我从没休过假，更不知道有病还可以休病假。这下可好啦！就这样，7天里我把偷偷摸摸画出来的插图草图在家里认真地重画了一部分。休息一星期后，这些插图还没有画完，于是，我就在复查的时候故意不吃药，再加上在检查我时，我憋了一口气儿，故意让血压仍然很高。就这样，我又休息了7天，这才把那33幅插图全部画了出来。”

我请教丁聪先生一个问题：“苦难可以磨练人的意志，使人更加坚信自己的信仰；也可以摧垮人的意志，使人消沉和堕落下去。您这20多年的劫难，怎么没有动摇您的信念呢？”

“这个问题问得很好。对不起朋友的事，我死也不干。他们编织的那些罪名我都认了，但是让我揭发别人，我坚决不干。我这个人从不做亏心事，再苦再累也吃得下、睡得香，因为我的良心安然。自杀我也不干，死得不

明不白，没啥意思。如果真到没路可走的时候，我就顺其自然。我不想做官，也不挡别人的道；不爱抛头露面，出风头。我的处事原则是：愿听逆耳之言，不做违心之事；岂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心。”

小丁四十才结婚

就一个生活话题，我们问丁先生：“您刚才讲，1958年您才有了个儿子。那个时候，您已经42岁了。您是不是为了事业才这么晚要孩子呢？”

丁聪笑着说：“我可是个晚婚晚育的模范，我结婚的时候已40岁了。”

我好奇地问：“那个时候又没有提倡晚婚晚育，您为什么结婚那么晚？是不是有特殊的原因？”

丁聪讲：“不瞒你说，我看见女人就害怕。抗日战争那阵子，我一直是在电影和话剧的圈子里工作，经常看到圈内人结婚、离婚如同儿戏，今天和这个结婚，明天就离婚，后天又和那个结婚。我从来不敢问他们对方的情况，因为说不准人家刚结婚可又离了婚，搞得很不好意思。我这个人很重感情，对这种婚姻害怕得很，所以一直不敢谈对象。

解放后，我的年岁大了，便不大好找对象，心里就想



1957年新婚中的丁聪、沈峻夫妇在住所前合影。

反正碰运气吧。我的终身大事成了我们单位的一件大事。夏衍曾经对我讲：‘这可不行，1956年一定要结了婚，所有的花费我都包了。’这一年也真巧，我碰到了比我小11岁的沈峻，她当时只有29岁。我们谈得很投机，很快就办了结婚登记手续，在1956年的最后一天‘突击’结了婚，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，我们正好可以休息一下。我只告诉了冯亦代一个人，除此之外，文化部和我在单位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就这么简单，但是手续完全具备，是合法